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瑰宝

——学习《刘少奇选集》上卷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

谢经华 虞崇胜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他以毕生的精力和杰出的才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近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以下简称《选集》)上卷选编的刘少奇同志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以及职工运动、白区工作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等各方面的重要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宝贵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成功地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选集》上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同志不但亲自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在实践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而且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一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入我国东北之后，又侵入华北。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①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鉴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根本的变化，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同志在瓦窑堡会议的发言中，高度赞扬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一九三六年春，为了加强北方局的领导，推动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派刘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的华北，硝烟四起，烽火遍地。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情绪迅速高涨，阶级关系急剧变动。而在我们党内，由于红军及陕北边区同全国其他地区还处在隔离状态，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尚未得到很好贯彻；加之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白区党组织遭到极大的摧残；华北地区保留下来的若干党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依旧被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地统治着。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

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刘少奇同志到达华北后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一九三六年四月，他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文章，五月至七月，又发表了《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和《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等公开信。在这些文章和通信中，他根据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精神，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深刻地批判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刘少奇同志精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关系。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因此，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这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②

怎样才能实现党的策略任务呢？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首先必须彻底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否则，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他还具体地分析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它的危害和根源，指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似乎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使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很难建立起来。因此，刘少奇同志大声疾呼：“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③还要教育我们的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刘少奇同志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同时，还严肃批评了党内的“空谈主义”的领导作风。他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党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任务和总政策确定后，每个同志应该把它研究清楚。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就不要在一切文件和讲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细心地分析各地区各方面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刘少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领导华北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他紧紧围绕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一中心任务，指导北方局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一，北方局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

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北平、天津党的组织和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其二，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广大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并以共产党员和“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为骨干，以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学生救国会等爱国团体为主要形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三，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了宋哲元、阎锡山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上层人物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和群众抗日浪潮的推动下有转向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可能，果断地派出得力的干部和党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同他们达成程度不一的合作抗日的协议，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上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所有这些，对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势力，进一步推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此，党中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④

二

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一个根本原则。刘少奇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为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扫清了障碍，而且在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适时而明确地强调了“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⑤早在西安事变前夕，刘少奇同志在他撰写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⑥的党内教材中，针对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全国抗日局面即将实现的形势，在继续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通过总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性以及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精辟地阐述了领导权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中心问题。

刘少奇同志认为当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这种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放弃与忽视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放弃与停止对于阶级斗争的领导，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放弃对于工农群众的独立组织与教育工作，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和领导等。产生这种右倾思想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正确，对革命转变问题不了解，对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为了防止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刘少奇同志着重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革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所以革命的领导者‘当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只能帮助资产阶级革命，待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指出“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已使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了，在以后还要危害革命的。”⑦他接着指出：有人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怀疑或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领袖。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国家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力量上都要强大得多。而无产阶级为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首先肃清封建势力与驱逐帝

国主义。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以出路，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而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虽然还有暂时的革命作用，但因为这些阶层的特别软弱及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和无产阶级力量对于它的威胁，它的这种革命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要求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⑧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应该而且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掌握，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⑨为了使全党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及时地掌握领导权，刘少奇同志具体地分析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七项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总合起来看，对于我党，对于无产阶级并没有变得不利。“领导权就是要在这些条件下来争取。”^⑩怎样争取呢？第一，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第二，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要使无产阶级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就要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加强与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加强与扩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工作。而要使无产阶级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则必须作到以下几点：（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评论各党各派的主张，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其他各党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在群众面前分别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来选择；（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论述，实际上解决了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问题，这就是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但在理论上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而且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革命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及时地清除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直接指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刘少奇同志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指出党在统一战线中应该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注意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和必要批评。他说：“当着同盟者起来向敌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给同盟者以援助是必要的。但无产阶级不只是援助同盟者，必须自己也起来向敌人斗争，而且要站到斗争的最前线。要批评同盟者在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向同盟者及群众提出自己在斗争中的独立主张。”^⑪他还

说：“在细小的不重要的个别的问题上，不应该和同盟者引起过多的不必要的纠纷，但在主要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毫不放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⑩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又不破裂统一战线。

针对那种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应该停止或削弱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刘少奇同志深刻地论述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社会各阶级间原来的矛盾和冲突。阶级斗争依然是存在的。而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因此，“认为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是不能联系的矛盾，这也是一种极危险的右倾思想。”^⑪当然，在进行阶级斗争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故意加紧反对资本家的方式，以免削弱统一战线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方局因北平失陷迁到山西太原。刘少奇同志到山西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和变化了的形势，及时地指导北方局实行策略上的转变。他指出：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确实掌握领导权。刘少奇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每当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和指明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为了全面贯彻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卓有成效地开展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刘少奇同志在为北方局起草的决定中，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了透彻的说明。他指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除开深入与扩大我党的政治宣传外，必须坚决广泛地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既要反对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的斗争，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的右的危险倾向；又要反对不顾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不必要地去刺激与吓退同盟者的左的错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主，而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⑫这样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讲究斗争艺术；既贯彻了原则的精神，又不是机械地贯彻。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北方局正确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正确处理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既防右又防左，使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刘少奇同志后来在总结华北工作时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⑬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寇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我华北及华中的抗日力量；国民党中汪精卫集团正准备公开投降敌人；蒋介石则由消极抗日转为积极反共，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新的危机。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

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的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刘少奇同志一到中原地区，就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他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政策，是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它的核心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情势，使大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反对我们，不敢破坏合作，并不得不继续和我们合作。”^④与右倾投降主义者以让步来求得与大资产阶级合作相反，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中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在目前强调统一，就会造成重大错误，就会重复一九二七年的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在与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一起，领导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严格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成功地打退了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刘少奇同志离开苏北返回延安的三年中，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华中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反顽斗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胜利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严重打击了敌伪；第二，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三，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第四，发展与建立了党的组织。党中央“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以至于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打下了基础。”^⑤

文如其人。从《选集》上卷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分丰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同志不愧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他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成功地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运用到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去，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创，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针，不仅直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而且对今后的统战工作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它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接指导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②③⑤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23—24、33、46、47—48、48、77、77、50、51、51、96、263、273、284页。

④ 转引自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胡服即刘少奇同志。

⑤ 《选集》上卷中收入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为其中的下篇。

重 要 补 正

本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43页第5行与第6行之间，漏掉“一九三六年 40岁”一句，特此补正。